

# 20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重读《路标》

安启念

【内容提要】《路标》文集的宗旨是批判革命知识分子。本身也是知识分子的文集作者十月革命后遭到镇压，文集所批判的革命知识分子也未能完全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不少人受到新政权的迫害。俄国知识分子极大地改变了整个20世纪俄国的面貌，但他们自己许多人命运悲惨。原因在于，在现代化道路上，俄国是落后国家，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自由、民主、人道主义不是社会发展产生的自然需要，是知识分子比照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提出的社会诉求，他们的理想与俄国的现实存在矛盾。落后的国情制约着他们。违背社会实际必然失败，符合社会实际则知识分子所得到的往往有悖于自己的理想。20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证明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真理性。没有理想，社会前进就没有动力和方向；不从实际出发，一切理想都会成为空想。处理好美好理想与客观实际的关系，是一门高深的政治艺术。

【关键词】《路标》 知识分子 理想与现实

【中图分类号】G13/17.5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19)05-0005-0020

【作者简介】安启念，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弗罗洛夫新人道主义研究》（项目批准号：13BZX002）阶段性成果。

1909年3月，一本名为《路标》的论文集在莫斯科出版。它的问世引起巨大社会反响：一年之内四次重印，回应文章或著作有200多篇（部）。各种政治派别——不论左派还是右派，各个领域的学者——哲学家、作家、法学家、经济学家，纷纷发表评论，仅列宁就在不到9个月的时间里两次做专题报告，并发表《论路标》一文，对文集加以猛烈批判。还有人在俄罗斯举行巡回讲座评论《路标》。《路标》在苏联时期遭封杀，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后，人们思考知识分子在国家解体中的责任问题，《路标》再次受到关注。从1990年到今天，《路标》累计出版发行30多万册。其问世的90周年、100周年，俄罗斯都组织了围绕它的学术研讨活动。

《路标》带有副标题——关于俄国知识分子的论文集，表明全书讨论的焦点是俄国知识分子问题。整个20世纪，知识分子在俄罗斯的社会变迁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的命运则让人感慨唏嘘。110年后重读《路标》，我们能在20世纪俄罗斯历史、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命运及其历史作用，进而在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等问题上，获得许多启示。

《路标》全书由前言和七篇论文组成，分别是：M. O. 格尔申宗撰写的《前言》和H. A. 别尔嘉耶夫的《哲学真理（истина）与知识分子的真理（правда）<sup>①</sup>》、С. Н. 布尔加科夫的《英雄主义与自我牺牲》、M. O. 格尔申宗的《创造性的自我意识》、A. C. 伊兹科耶夫的《关于青年知识分子》、B. A. 基斯嘉柯夫斯基的《保卫法律》、П. Б. 司徒卢威的《知识分子与革命》、С. Л. 弗兰克的《虚无主义伦理学》等论文。七位作者的学术观点及政治表现不尽相同，但他们的论文从不同角度指向了同一个主题，即俄国知识分子及其在俄国历史中的作用，而且都对知识分子提出批评。俄国在19世纪形成的知识分子概念，所指的不仅是受过良好教育有文化、有知识的人，而且是他们之中对沙皇专制统治提出批评并积极捍卫人民利益对民众进行启蒙的人。《路标》所批判的知识分子，主要指民粹派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布尔什维克。

《哲学真理（истина）与知识分子的真理（правда）》集中讨论知识分子的

<sup>①</sup> 俄语的 истина 和 правда 在其他语言中都可以译作“真理”，但在俄语中二者有所区别。истина 指与对象一致的、正确的、可靠的、真正的、准确的、公正的存在，在宗教背景中视为上帝的名称之一；правда 具有感情色彩，突出正确性、公正性以及正义性、正当性，有人称它为具有道德价值的 истина。

哲学思想。作者别尔嘉耶夫是白银时代俄罗斯宗教唯心主义哲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站在宗教唯心主义的立场上对俄国知识分子的哲学思想做了深入的分析与批判。他提出，哲学是一种完整的世界观，是科学与宗教、知识与信仰的结合，是对欧洲哲学理性的神秘主义补充。他所说的哲学，实际上即19世纪70年代B. Л. 索洛维约夫创立并在世纪之交走向繁荣的俄罗斯宗教唯心主义哲学。由于带有宗教维度，他这里的哲学不仅是从真、善、美多个角度对世界的认识，而且与对上帝的信仰相关，具有绝对意义。在知识分子那里，哲学不是对真理（истина）的追求，而是发动社会革命实现民众利益和人类幸福的工具。如果真理（истина）的毁灭能够给民众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那么就让它做出牺牲；如果真理妨碍了打倒专制制度，那就打倒真理。民众的利益高于真、善、美，高于“对上帝的爱”。俄国知识分子向往西方文明和西方哲学，19世纪60年代沉湎于唯物主义，70年代崇尚实证主义，90年代热衷于阅读马克思主义，随后又吹捧经验批判主义。他们把公正理解为平均主义，把社会之善理解为民众的物质利益，认为满足民众物质利益的途径是开展经济斗争、政治斗争，从外部改造社会。他们对哲学的错误立场、错误认识，他们胸中的情绪，使他们不可能正确理解欧洲哲学。他们歪曲了科学实证主义、经济唯物主义、新康德主义、经验批判主义以及尼采哲学。别尔嘉耶夫特别指出了知识分子（具体而言是布尔什维克）对经济唯物主义也即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他说：经济唯物主义强调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客观性、科学性，用客观的生产因素解释分配形式、社会制度及不同社会群体的主观世界。俄国知识分子由于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作用，必然主观地解释经济唯物主义——“在俄国本土上，经济唯物主义失去了其自身的客观特质。生产创造过程被置于第二位，与此同时，社会民主主义主观的阶级层面占据了首位。在我们这里，马克思主义经过民粹主义的改造，经济唯物主义变成了新形式的‘主观社会学’。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平等尤为崇尚，对社会主义结局的临近和在俄国早于西方实现这种结局的可能性尤为坚信。客观真理的过程最终在主观过程中、在‘阶级’观点和阶级心理中湮没了。在俄国，经济唯物主义的哲学变成了特殊的‘阶级的主观主义’”<sup>①</sup>。

别尔嘉耶夫强调，知识分子只有把注意力聚焦在人的内心世界才能使自己以及广大民众摆脱外在条件的奴役，人的精神境界得到提升。这是俄国社会能够完

<sup>①</sup> [俄]基斯嘉柯夫斯基等：《路标集》，彭甄、曾子平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善和发展的唯一道路。它要求知识分子放弃无神论，把知识与信仰结合起来。

布尔加科夫的《英雄主义与自我牺牲》一文就知识分子发动社会革命的深层原因做了分析。他认为：在俄国，革命是知识分子的革命。知识分子从精神上塑造了民众的本能性的愿望，用自己的激情和话语点燃它们，他们充当了巨大革命机体的神经和大脑，就此而言，革命是知识分子的精神产儿<sup>①</sup>。知识分子还为革命提供了先进战士、前卫、鼓动家、宣传家。

俄国知识分子热衷于社会革命是因为他们心中充斥着旨在拯救劳苦大众乃至整个人类的英雄主义。彼得一世改革打开了俄国的门窗，与西方的先进技术一道，欧洲先进的思想文化涌进俄国。知识分子得风气之先，掌握了西方的文化、教育，成为它们与俄国民众之间的桥梁。向西方学习是落后的俄国走向强盛的唯一途径，而知识分子肩负了教化和拯救民众振兴国家的历史责任。他们扮演了启蒙者的角色，用以启蒙民众的是欧洲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否定神的存在，用人取代上帝，实际上是一种人神宗教，把人作为神加以崇拜的宗教。为这一宗教所鼓舞，俄国知识分子觉得自己是得到承认的祖国未来的预言者，是光明和欧洲教育在俄国的唯一承载者。自己祖国的一切都笼罩在无法穿透的黑暗之中，一切都那么野蛮，都与自己格格不入。他自认为是自己祖国的监护人，并决定按照自己的理解与能力拯救它<sup>②</sup>。这种英雄主义使他们像法国革命中的雅各宾派一样，孜孜以求“夺取政权”，实行“专政”。英雄总是以单数思维，相互之间陷入残酷的派别斗争，乃至相互杀害，不可避免。他们把自己视为上帝，为实现拯救民众的高尚目标，“一切都被允许”，热衷于采用极端主义的行动手段。知识分子的革命是一种宗教般的自我牺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对他们做了深入刻画。布尔加科夫强调，真正的幸福不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而在于每个人都净化自己的灵魂，脚踏实地做好各项具体工作。只有宗教才能治愈并拯救俄国。知识分子应该回归宗教，恢复内心的平静，把一切献给上帝，为了他人背负十字架。

其他几篇文章，基本观点一致，侧重点和切入问题的角度各有不同。《创造性的自我意识》号召复兴个性中的创造性自我意识，把它视为社会建构的基础。最值得注意的是此文对知识分子与民众关系的分析。俄国民众笃信宗教，知识分子信奉无神论，从根本上决定了在民众眼中知识分子不是健全人。民众需要的是

① 参见[俄]基斯嘉柯夫斯基等：《路标集》，第3页。

② 同上，第34页。

解决生活中的具体问题，知识分子为社会舆论所左右，热衷于在广场上高谈阔论。他的任何启蒙工作都是徒劳。“我们是何许人呢，我们不仅不能幻想与民众融合——我们对他们的恐惧，应该超过了对当局颁布的各种死刑的恐惧，我们应该祝福当局，只有它才用刺刀和监狱将我们与狂暴的民众隔离开来。”<sup>①</sup>知识分子应该遵循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教导，回归内心的精神生活。《关于青年知识分子》分析了俄国学校教育与革命知识分子的关系，认为是学校教育培养了没有文化的左倾的以自我牺牲为荣的革命者。《保卫法律》批评俄国缺少法制，知识分子则把法律与资本主义相等同，反对立宪，不知捍卫言论、集会等最起码的人权。知识分子只有专注于内心世界，才能认识自我完善的绝对价值以及维护社会秩序的法律所具有的相对价值，唤醒自己的法律意识。《知识分子与革命》强调，自普加乔夫暴动以来的历次革命都给社会带来极大的破坏，知识分子思想政治上的激进主义与民众本能的社会激进主义相结合是20世纪初社会动荡的根源。政治状况是由人的内在完善决定的，知识分子应该从关注人的外在世界转向人的内心世界。《虚无主义伦理学》批判了知识分子追求的价值目标。它指出，得自宗教信仰的人内心对真善美的追求是人的绝对价值，知识分子否定宗教从而否定价值的绝对性，把幸福等同于物质享受，于是执着于分配问题，进而热衷于社会革命、剥夺剥削者、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只能带来道德沦丧和社会灾难。出路在于从反文化的虚无主义道德说教转向具有文化建设意义的宗教人道主义。

《路标》的《前言》对全书做了如下概括：作者们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有分歧，“他们的共同主张是承认精神生活对于社会生活的外在形式，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优先地位。就是说，个人的内在生活是人的存在的唯一创造性力量，人的内在生活而非政治秩序的那些独立自主的原理，是一切社会建设的唯一的坚实基础”<sup>②</sup>。

## 二

《路标》批判俄国知识分子，然而作者们自己实际上也属于俄国知识分子<sup>③</sup>。一切现代化道路上的后发展国家都会受到先进国家的冲击，而最先对此做

① 参见〔俄〕基斯嘉柯夫斯基等：《路标集》，第83—84页。

② Вехи. М., 1909 г. С. 1.

③ См.: Свободное слово,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ая хроника: 1998-1999. М. 2000. С. 187.

出反应的总是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他们率先接受了先进国家的思想、文化，对自己国家的落后与人民的愚昧感受格外痛切，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的幸福成为他们的梦想。这些人就是知识分子。梦想相同，但在实现梦想的具体途径上知识分子产生了分歧。一些人主张通过社会革命改变社会制度建设社会主义，他们就是《路标》所批判的革命知识分子——社会主义者；另一些人主张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宪政、实行社会改良，而这一切的前提是人的精神世界的提升完善，他们就是《路标》的作者及与他们观点相同的人，或称《路标》派。这些人被认为是自由主义者。《路标》是俄国知识分子内部分裂的产物。

《路标》主张提升和完善人的精神世界，以对真善美的追求，以人的自律和对他人的爱，改变社会，以避免赤裸裸的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以及为此发动阶级斗争、社会革命，造成流血与仇恨，造成道德灾难。他们的主张高尚、诱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然而历史表明，在双方的斗争中，他们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路标》的出版没能阻挡革命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者的前进步伐。1917年2月，沙皇的反动统治在群众革命中终结，同年10月布尔什维克发动革命夺取政权。布尔什维克赢得了捍卫政权的国内战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社会改造，并于1936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制度。《路标》的作者呢？别尔嘉耶夫1920年第一次被捕，1922年再次被捕并于是年8月被苏维埃政府驱逐出境。布尔加科夫，1918年成为神父，1923年被苏维埃政府驱逐出境。格尔申宗在十月革命后与布尔什维克政府合作，1925年去世。伊兹科耶夫，1918年11月至1919年1月被流放伏尔加格勒挖战壕，1922年被苏维埃政府驱逐出境。基斯嘉柯夫斯基与苏维埃政府合作，1920年去世。司徒卢威，十月革命后参加白军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1918年12月移民芬兰，两个月后回国；1920年再次移民国外，1942年曾被纳粹逮捕，1944年于巴黎去世。弗兰克，1922年被苏维埃政府驱逐出境。

《路标》的作者们思想高尚，至今带有诱人的光环，他们对革命知识分子的指责也似乎在十月革命后得到验证，或者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确如他们批判的那样充斥着暴力、恐怖，并且危害人的道德。但是为什么在俄国谁都不能阻挡革命知识分子在斗争中取得胜利，相反，在更深的层次上忧国忧民精神高尚的《路标》作者们却命运悲惨？

答案在俄国社会的客观现实之中。

首先，革命知识分子在俄国知识分子中始终占据多数。弗兰克在其收入《路标》



的论文《虚无主义伦理学》中说：“尽管俄国知识分子信奉的政治和社会理论不同，但民粹主义思想在他们心中的地位数十年来一直没有动摇；直到现在（1909年——引者注）他们依然神圣地捍卫民粹主义，竭力避免使其受到歪曲和破坏。民粹运动依然是知识分子普遍坚信的纲领。”<sup>①</sup>这种情况直到1917年没有改变：“直到1917年，绝大多数文化阶层（尽管97%—98%的知识分子是无党派人士）都支持民粹主义思想。”<sup>②</sup>

其次，革命知识分子也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工人、农民是革命知识分子的主要社会基础，他们在俄国占据人口的绝大多数。19世纪末和1913年俄国社会的阶级构成分别详见表1和表2。

表1 19世纪末俄国社会的阶级构成

阶级成分	人口数量（单位：万）	占总人口百分比（%）
大资产阶级、地主、高级官吏等	300	2.4
殷实自耕农	2 310	18.4
贫穷自耕农	3 580	28.5
半无产阶级	4 170	33.2
无产阶级	2 200	17.5
人口总数	12 560	100.0

资料来源：Россий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 власть общество культура. М. 2017 г. С.155

表2 1913年俄国社会的阶级构成

阶级成分	人口数量（单位：万）	占总人口百分比（%）
大资产阶级、地主、高级官吏等	410	2.5
殷实自耕农	3 150	19
贫穷自耕农	4 200	25.3
半无产阶级	5 560	33.6
无产阶级	3 250	19.6
人口总数	16 570	100

资料来源：Россий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 власть общество культура. М. 2017 г. С.155

统计数字表明，从19世纪末到1913年，革命知识分子的打击对象略多于人口总数的2%，革命动力，也即革命知识分子宣传鼓动的对象和他们在革命中依靠

① [俄]Б.Н. 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下卷），张广翔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9页。

② 同上。

的力量，将近占总人口的80%。

社会革命是阶级战争。俄国社会造就了占人口多数的被奴役受剥削的工农大众，他们天生具有推翻现存制度翻身解放的要求。1861年改革以后，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发展，工人阶级崛起，农村两极分化日益明显，工人罢工、农民暴动越来越频繁。知识分子的革命鼓动很容易在广大民众中得到共鸣。在他们的面前，《路标》对道德完善和精神修养的推崇无人喝彩，成为苍白无力的美丽说教，而占人口极少数的社会上层根本不可能阻挡群众革命的洪流。实际上《路标》的阶级立场是和广大民众直接对立的。格尔申宗的那句话“我们是何许人呢，我们不仅不能幻想与民众融合——我们对他们的恐惧，应该超过了对当局颁布的各种死刑的恐惧，我们应该祝福当局，只有它才用刺刀和监狱将我们与狂暴的民众隔离开来”<sup>①</sup>，就是对这一点的最好说明。

1937年，即《路标》发表将近30年、布尔什维克执政20年以后，别尔嘉耶夫对《路标》做了反思。他说：“《路标》对革命知识分子的唯物主义、实证主义、功利主义，对他们漠视精神生活的最高价值给予激烈批评，进行了为精神而战的斗争，但是这一斗争没有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自由主义思想、法律思想以及社会改良思想，在俄国是乌托邦主义思想，布尔什维主义倒显得空想性最少、最现实……”<sup>②</sup>他还说：“20世纪初，俄国有一场真正的文化、宗教、哲学、艺术的复兴，这里出现了向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宗教哲学思想的回归。人们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转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索洛维约夫。但是这些文化的唯心主义潮流开始失去与社会革命运动的联系，它们越来越失去广泛的社会基础，形成了一些对俄罗斯人民和社会各界没有什么影响的文化精英人物。唯心主义运动的弱点就在这里。”<sup>③</sup>1946年，他在《俄罗斯思想》中再次承认：19世纪末20世纪初，只有一部分人离开生活现实转向精神世界、超验世界，大部分知识分子继续专注于敌视宗教的唯物主义和实证论；《路标》作者及他们的立宪民主党“在人民群众中没有基础，并且没有能够鼓舞人的思想。按照俄罗斯人的气质，革命只能是极权主义的”<sup>④</sup>。

与《路标》作者相反，布尔什维克与工人农民，以及穿上军装的农民子弟——

① [俄]Б.Н.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下卷），张广翔等译，第83—84页。

② Бердяев Н. А. 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 М., 1990. С. 93.

③ Там же. С. 90-91.

④ [俄]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邱守娟译，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42页、240页。



士兵，同呼吸共命运，准确把握他们的要求，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及时提出“工厂属于工人！土地属于农民！权力属于人民！打倒资本家部长！”的口号，提出立即结束战争，号召以武力夺取政权。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知识分子中态度最激烈，最崇尚暴力，是《路标》的主要批判对象，但在1917年准确反映了广大民众的要求，迅速获得工人、农民、士兵的支持。他们取得政权势在必成。

抗日战争期间，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傅斯年，在延安访问时拜会毛泽东，毛泽东书写了唐朝诗人章碣的诗《焚书坑》赠送给他。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社会革命的主要力量从来都不是崇尚精神生活的读书人。布尔什维克的成功和《路标》作者的悲惨命运，只是以俄国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

### 三

历史的复杂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布尔什维克获得了政权，但是从一定角度看，他们的事业并没有成功。作为知识分子，他们也是失败者。因为布尔什维克建成的社会主义社会，与他们以及其他革命知识分子十月革命前的理想相去甚远。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镇压反对派，可以理解，因为这是巩固政权所必须的，但是在政权巩固以后他们建成的社会主义制度，却远远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他们中大多数人原先想象的那样。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后用以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从不同角度做过论述，社会民主是基本特点。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特别是在十月革命后的许多著作中论述更多。布尔什维克之所以在俄国发动革命，就是想要通过革命夺取政权，然后借助政权的力量在俄国建立比资本主义更民主更公平更幸福的社会主义制度。列宁在批判《路标》时就一直高举为捍卫民主而斗争的旗帜。1919年他敏锐地看到了苏维埃政权内部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到1923年，更把反对官僚主义维护苏维埃政权的纯洁性视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为此甚至提出工农检察院要监督各级政府直至党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对比这些论述，苏联于20世纪30年代建成的社会主义制度以高度集中为特点，一切都掌握在党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手中，斯大林被奉为神，凌驾于党纪国法和全体民众之上，人们看到的已经远

远不是官僚主义问题了。这种状况正是列宁以及绝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当年坚决反对的。

与制造个人崇拜相联系，斯大林强化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社会和共产党内部大搞阶级斗争。他提出，随着社会主义走向胜利，阶级斗争更加激烈。他以阶级斗争的方式进行全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运动仅在乌克兰就造成数百万人死亡。文化领域也开展战胜资产阶级的残酷斗争。大量哲学家被投入监狱，大批知识分子，甚至不关心政治一心钻研业务的教授、医生、工程师，遭到迫害；连《神经病理学和精神病学》杂志都在1932年2月刊登题为《争取在精神性病理学战线发起布尔什维克式的进攻》的文章<sup>①</sup>。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更是触目惊心：十月革命后第一届苏维埃政府共15名人民委员，除了列宁和斯大林之外还有13人，其中4人在大清洗开始前自然死亡，剩余9人全部被处死。列宁去世后选出的7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6人被杀害。十月革命时俄国首都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苏联红军的缔造者托洛茨基，子女离奇死亡，本人流亡国外，1940年在墨西哥被斯大林派人追杀。布哈林，布尔什维克头号理论家，被列宁称作“全党的宠儿”，1938年被枪毙。列宁在世时最后一次党代表大会的1162名代表中1095名被杀害。苏军的5名元帅中3名被处死；15个集团军司令中13人被枪毙。1936年苏联社会主义宪法的两名主要起草人在宪法通过后不久被枪毙。这些人大多数属于《路标》所说的革命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身居高位的人。革命吞掉了自己的“母亲”。这无论如何不是发动革命的知识分子们想要的结果。

上述事实表明，那些遭到《路标》批判但成功取得政权并镇压了《路标》派自由主义者的革命知识分子，从一个角度看其事业并没有成功，他们也是失败者。

1851年12月，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依靠农民的支持发动政变，废除共和，复辟帝制。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此做了深刻分析。他说：“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

<sup>①</sup> 参见陈启能：《斯大林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及其影响》，载《世界历史》1989年第8期。

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而形成的，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关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sup>①</sup>马克思说得非常正确。农民没有经过市场经济的培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彼此孤立缺少联系与竞争，使他们不能形成清醒的阶级意识，缺少法制观念，没有依靠自己的力量争取自己的利益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必然要寻找或者接受一个高高在上代表并管理自己的“皇帝”，与此相应，他们需要的是从上面支配他们的行政权力。康德把教育人们“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视为启蒙的主要内容，是有道理的。

历史也一再向我们证明，任何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国家，情况必然如马克思所说。农民和刚刚脱离农民地位的人占据人口多数这一特点，使斯大林对整个苏联社会的集中控制成为历史的必然。

列宁等革命知识分子得到的并不全是自己想要的东西。

#### 四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几乎从第二天开始，苏联便出现了非斯大林化运动。最早是文学界呼吁“解冻”，紧接着是理论界重提“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出现了以强调人的主体性为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派；再往后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做的著名的秘密报告，报告后很快出现了为“大清洗”受害者昭雪的浪潮。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召开，继续批判斯大林并在通过的新党纲中提出“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的口号。上述事件矛头所指都是斯大林，都在强调人的价值，它们聚焦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思潮。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6—567页。

20世纪70年代初，罗马俱乐部发表第一份报告《增长的极限》，向全世界揭示了经济快速增长造成日益严重的资源危机，人类物质生产不可能无限增长，正在达到极限。哲学家И. Т. 弗罗洛夫随即组织苏联哲学界集中研究资源、环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等危及人类命运的全球性问题。他们意识到，不仅物质财富的增长遇到极限，而且整个人类的生存都因人对自然界的掠夺和相互竞争而受到威胁。弗罗洛夫认为，人道主义的实现不能再推到“以后”，应当立即行动，而为此又需要对物质生产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加以控制，需要社会民主。他响亮提出“新人道主义”口号。口号很快被整个社会接受，人道主义成为深入苏联一切领域的社会思潮。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受到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大量知识分子投入用人道主义和民主理想改造苏联的斗争。

从70年代起，苏联经济发展陷入停滞，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在苏联遇到更深刻的挑战。

以高度集中为特征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虽然有悖于布尔什维克的初衷，但它符合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国情，因而在苏联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是当时苏联能够保持社会稳定、经济高速发展及随后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原因。然而一切都处在永恒的运动之中。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按照辩证法，今天合理的，明天将成为不合理、不现实的，应该灭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兴起新科学技术革命，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按照苏联哲学家的说法，生产变为科学技术的运用。最主要的生产力不再是劳动者，而是科学技术。管理也成为科学。科技创新成为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而掌握科学技术及其创新的是知识分子。生产力和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最终都必须落实到知识分子头脑里的思维创造以及把所创造的成果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在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下，一切都得服从行政命令，听命于上级，社会没有思想自由；在意识形态高压下，知识分子动辄得咎，科技创新举步维艰。由于没有市场竞争，企业也缺少科学技术创新的动力。整个苏联，除了军事工业因为处在与美国的激烈竞争中而有充沛活力以外，生产技术越来越落后。即使企业获得了新的技术，在计划经济下也需要经过层层行政审批才能用于生产，效率十分低下。

由于上述原因，从70年代起苏联经济和社会陷入停滞，与资本主义世界原本日益接近的经济水平，差距逐渐拉大。到80年代初，发动社会改革，破除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模式，尊重人的独立性、主体性、创造性，已经是苏联上上下下

的共识。改革的呼声与人道主义思潮目标吻合，相互激荡，人道主义日益成为改革的旗帜。知识分子再次扛起造福人民挽救国家的历史重任。

1985年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是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夫人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并长期在高校担任哲学教师。苏联哲学和苏联社会的人道主义思潮深刻影响了戈尔巴乔夫。他把人道主义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把建设“民主人道的社会主义”作为改革的基本目标，把自上而下强制推行“民主化、公开性”作为改革的基本方针。人道主义、民主政治不是他的个人诉求，而是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甚至整个社会的要求。戈尔巴乔夫的主要思想都来自知识分子。哲学家弗罗洛夫是苏联哲学界乃至整个社会人道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改革伊始，戈尔巴乔夫让他充当自己的助手，随后任命他为党刊《共产党人》和党报《真理报》的主编，提拔他为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民主人道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就是弗罗洛夫提出然后被戈尔巴乔夫采纳的。为了建设民主人道的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推行“民主化、公开性”方针，即干部的任免由选票决定，放弃共产党对新闻出版的一切监管。其结果是：民主化突然间打破了苏共延续半个多世纪的国家治理体系；公开性引发了全社会的历史反思，并且很快形成揭露社会黑暗面、批评苏联共产党、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经济下滑，社会失序，思想混乱，共产党的威信一落千丈，党内斗争日趋激烈，涌现出几百个政治组织争夺政权，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到1990年，苏共逐渐失去对局势的控制，终于在1991年年底戈尔巴乔夫被他自己扶植起来的“民主派”叶利钦赶出克里姆林宫，布尔什维克创建的社会主义苏联不复存在。

这一剧变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俄国终结，苏联共产党不仅丧失政权而且就此消失。布尔什维克，《路标》所批判的革命知识分子，近百年的奋斗成果毁于一旦，他们的社会主义实验失败了。

## 五

20世纪一代又一代俄罗斯知识分子，为了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前仆后继，不屈不挠。他们的努力促进了俄国的现代化进程，构成了波澜壮阔的20世纪俄国历史。白银时代宗教唯心主义哲学是俄罗斯最重要的哲学成就，俄罗斯人至今为它感到自豪。《路标》派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弗兰克都是这一哲



学的代表性人物，其中布尔加科夫被公认为它的主要奠基人，别尔嘉耶夫则在俄罗斯国内外影响最大，是读者最多的俄国哲学家。布尔什维克代表的革命知识分子终结了俄国沙皇的封建统治，建立了有俄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捍卫了国家主权，一度创建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包括戈尔巴乔夫、弗罗洛夫在内的“六十年代人”，即五十年代大学毕业、六十年代起逐渐掌管苏联社会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在俄国开始了新的顺应世界潮流的探索，深刻改变了世界。这些成就不容否认。但是，他们都没有能够按照自己的设计完成对社会的改造，有的还给国家带来灾难；许多人的个人命运则只能用悲壮二字形容。

对以上所述俄国知识分子的事业和命运略加概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要用自己头脑中来自西方的先进思想改造俄罗斯和俄罗斯人。这样做必然遇到一个共同的问题，这就是他们头脑里的思想、设计与俄国的客观实际即俄国国情的关系问题。俄国最大的国情是什么？是国家的落后。

尽管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沙皇彼得就把俄国拖上改革之路，开始了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的历程，此后俄国又出现一波又一波的改革浪潮，但是直到1917年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俄国依然是落后的封建国家，人们称之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贵族地主把持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政权，沙皇拥有不受任何制约的绝对权力；经济上以农业为主，国内市场狭小，外贸主要是用粮食换取国外的工业制品；文化上绝大多数人笃信东正教，文盲众多。俄国还没有完全走出现代化的起步阶段。1917年革命推翻了沙皇的封建统治，然而这一革命与英国、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同，它不是俄国的资产阶级和其他资本主义因素不断壮大成熟取代封建主义的自然结果，而是内外矛盾交织激荡，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危机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宣传鼓动等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按照历史唯物主义，1917年俄国爆发推翻封建统治的革命带有“偶然性”。俄国不是苦于资本主义太多，而是苦于资本主义太少。

国家的现代化，关键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社会和国家各个方面现代化的集中体现，又是国家和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是封建制度的产物，前面所引用的马克思的论述就是从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入手分析法国农民的心理特点和政治诉求的。一个小国有可能全面接受外来影响实现现代化道路上的跨越式发展，对于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只有自身市场经



济的长期充分发展，才能建立符合现代化需要的生产力以及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使社会得到彻底改造，使人民成为现代民主社会所需要的公民。就农民而言，只有在市场竞争中，他们才能得到普遍的启蒙，培养自己的主体性、能动性以及对自由和个人幸福的渴求，才能产生对社会契约内在的要求，进而确立社会契约所需要的平等、公正、法制、民主等等观念。西方那些现代化道路上的先行国家的历史告诉我们，自由、平等、公正、法制、民主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市场经济是农民和整个社会得到改造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唯一途径。俄国也不会例外。社会变革是由人来实现的，从这样的角度看，俄国社会的落后集中体现在占人口大多数的是农民而不是工人，或者说俄罗斯是农民的国家。

这是20世纪俄国知识分子无法回避并决定他们命运的基本国情，由前所述可以看出，他们的成功与失败，他们的一切行动，都受到这一国情的制约。

由于农民占人口大多数，自由、平等、科学理性、人道主义的实现，民主、法制的建立，科学社会主义变成现实，在20世纪的俄国都只是知识分子的美好理想。《路标》派以为，只要俄罗斯人回归精神生活，完善道德、净化灵魂，就可以避免社会革命，用改良的手段确立宪政民主。他们看不到，1905年俄国沙皇在光天化日之下向手持圣像和他本人画像和平请愿的工人及其家人开枪；他们看不到广大民众首先关心的不是道德问题，而是面包问题，一旦和平途径不能满足民众的需要，革命便不可避免。作为哲学家，《路标》派值得尊重，但他们的政治思想太脱离实际了。

列宁和他所代表的革命知识分子顺应广大民众的需要，发动革命取得政权，然而一旦他们要把自己的政治理想付诸实施时，他们与民众（主要是农民）的冲突立即显现出来。列宁在1920年说：“资产阶级的反抗，由于资产阶级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资产阶级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这是因为世界上可惜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sup>①</sup>显然，农民在这里被列入专政对象的范畴。十月革命后列宁试图借助政权的力量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因为民众，主要是农民，强烈抵制而告失败。他说：“我们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励，我们首先激发了人民的一般政治热情，然后又激发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了他们的军事热情，我们曾计划依靠这种热情直接实现与一般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务。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sup>①</sup> 迫于形势，列宁不得不向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让步，实行新经济政策。他还在晚年提出合作制、文化革命和改组工农检察院等问题。列宁的这些做法目的都在于消除自己的理想与俄国国情之间的鸿沟，赋予它科学性。

1924年列宁去世，三年以后斯大林结束新经济政策，开始社会主义改造，向资本主义发起全面进攻。当时的苏联仍然是落后的农业社会，既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所需要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也不具备占人口多数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决定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他对整个社会发起的战争，决定了他不得求助于残酷的“阶级斗争”；同时决定了他建成的只能是没有无产阶级民主可言、以高度集中为特点、符合农民需要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设想的社会主义相比，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倒退，但它符合苏联的国情，具有现实性。

戈尔巴乔夫同样遇到了美好理想与落后现实的矛盾。1917年，刚刚走出沙皇专制统治的俄国人很快进入以高度集中为特点的社会主义苏联。到80年代，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知识分子和西方宣传的影响下向往自由、平等、民主、人道主义，但这只是他们的主观愿望而已。自由、平等、民主、人道主义需要有相应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为基础，它们是市场经济培育的结果，是社会发展的自然产物。整个俄罗斯历史，自古以来直到戈尔巴乔夫改革开始，从来没有过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因此它们不是苏联社会的内在需要。改革的失败是苏联现实国情对戈尔巴乔夫做出的裁决。

面对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俄国知识分子不得不求助于人的主观能动性<sup>②</sup>。资本主义的落后决定了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资产阶级的软弱使得他们未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例如彻底消灭封建制度、确立资产阶级民主等等。在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时，列宁说：“我们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作为我们主要的和真正的工作，即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工作的‘副产品’顺便解决了。……前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6页。

<sup>②</sup> 这是革命知识分子与《路标》派的共同之处。区别在于，前者诉诸阶级斗争和政权的力量，后者诉诸道德说教。原因是他们的思想都走在俄国现实的前面。

一革命可以转变为后一革命。后一革命可以顺便解决前一革命的问题。后一革命可以巩固前一革命的事业。斗争，只有斗争，才能决定后一革命能比前一革命超出多远。”<sup>①</sup>他认为依靠布尔什维克党的斗争就可以在俄国顺便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建立比资产阶级民主更充分的工人农民享受的最高限度的民主。显然，他把资产阶级革命和民主制度的建立，把俄国的现代化，看得过于简单了，并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去世之前列宁对问题有了新的理解，提出许多宝贵设想，然而天不假年，设想尚未变为现实，苏联社会发展已经进入另一条轨道——斯大林的轨道了。

斯大林除了用无情斗争的手段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以外，还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为自己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合理性辩护。他说：“尽管社会生活现象错综复杂，但是社会历史科学能够成为例如生物学一样的精密的科学，能够拿社会发展规律来实际应用。”<sup>②</sup>他强调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不应当从‘伟大人物’的善良愿望出发，而应当从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sup>③</sup>。这当然是正确的，然而他坚信自己已经掌握了苏联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客观规律是不可违背的，是可以拿来就运用的。自己成为客观规律的化身，不服从自己的意愿就是在违背客观规律，当然一切形式的政治斗争都是合理的、必然胜利的。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斯大林把它变为按照自己的思想对社会现实的强制性裁剪。

戈尔巴乔夫接受了弗罗洛夫的新人道主义思想，从解决各种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出发，站在无可超越的道德制高点。作为一种哲学理论，新人道主义十分宝贵，但是要把它落实到苏联的现实生活中，必须考虑苏联的实际，寻找切实可行的具体操作方法。这是政治家应该完成的任务。戈尔巴乔夫无视苏联的实际情况，借助苏联共产党的绝对权威强制推行民主化、公开性，推行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500天计划”。他没有看到，许多手中握有权力的官僚主义者利益已经固化，与旧体制融为一体，理想信念淡漠；他没有看到，这时苏联超过60%的人离开了农村，但是他们长期生活在以高度集中为特征的社会制度之下，身上的封建主义遗迹没能彻底清除，缺少现代民主制度所需要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社会也没有相应的契约精神、法制观念和普遍的经济联系。民主化、公开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6页。

② 《斯大林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5—436页。

③ 同上，第437页。

性是戈尔巴乔夫接受外来影响依靠手中的权力自上而下强加在苏联人身上的，他的改革体现出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其结果是遍布全国的自上而下行政权力的集中控制体系被冲垮了，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却建立不起来。人们的思想陷入混乱、政治局势动荡失控、经济日趋崩溃，成为改革的必然结果。

20世纪俄国知识分子可能都是如《路标》所说甘愿为国家为民众自我牺牲的人，但是他们的命运告诉我们，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对的。社会发展的确有客观规律，任何把主观愿望强加在现实生活身上的做法都注定不能如愿，不管它采用什么形式。20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还告诉我们，《路标》派主张提升人的精神境界而不是追求物质利益，以最终实现人类的和谐友爱；布尔什维克把沿着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人类解放作为奋斗目标，意义极为重要。俄国知识分子有成功的一面，就他们的失败而言，主要是因为没有找到自己提出的俄国社会发展高尚目标与现实国情之间的结合点。为什么找不到？理想、“初衷”的淡化甚至因利益固化把手段等同于目的，是深层原因。没有理想，社会前进就没有方向、没有动力；不从实际出发，一切美好理想都是空想。这是20世纪俄国知识分子最基本的经验教训。

一般地说，人的主观愿望、美好理想与客观规律之间的关系任何时候都是社会发展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在落后国家，情况尤其如此。因为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往往表现为知识分子运用外来的先进国家的经验与成果对自己国家的自觉改造。

重读110年前发表的《路标》，我们深切感受到，处理好美好理想与客观实际的关系，是一门高深的政治艺术。

（责任编辑 靳会新）

## Судьба рус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в XX веке — перечитывая «Вехи»

Ань Цинянь

**【Аннотация】** Главной целью выпуска сборника «Вехи» являлась критика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После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авторы сборника «Вехи», которые также были интеллигентами, подверглись давлению, а критикуемая им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не смогла в полной мере реализовать свои социальные идеалы, более того, многие подверглись преследованиям со стороны нового режима.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всего XX века рус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кардинальным образом меняла облик России, при этом их личная судьба была трагична. Причина заключалась в том, что вставшая на путь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Россия была отсталой страной, плотно опутанной феодальными пережитками. Свобода, демократия и гуманизм - это естественные потребности, рождающиеся в процессе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это социальные требования, выдвигаемые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ей по образцу передовых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Запада, их идеалы противоречил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Их сдерживала отсталость страны. Движение наперекор социальной реальности обречено на провал, и то, что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социальной реальностью получает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зачастую не соответствует ее идеалам. Судьба рус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в XX веке подтверждает правдивость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материализма. Без идеалов у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прогресса нет мотивации и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все идеалы, оторванные от реальности, становятся иллюзиями. Выстраивание связи между прекрасными идеалами и объективной реальностью является тонким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искусством.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Вехи»;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идеал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 The Fate of Russian Intellectuals in the 20<sup>th</sup> Century — Reread Anthology “Road Sigh”

An Qinian

**Abstract:** The aim of the anthology “Road signs” is to criticize revolutionary intellectuals. The authors of an anthology, themselves are the intellectuals, were suppressed after the October revolution. The revolutionary intellectuals, criticized by the anthology, also failed to fully realize their social ideals and many of them were persecuted by the new regime. Russian intellectuals have greatly changed the face of Russia throughout the 20<sup>th</sup> century, but many suffered tragic fate because Russia is a backward country with the strong feudal color, freedom, democracy and humanitarianism didn’t emerges from the social development need but from social demands put forward by the intellectuals according to the western advanced capitalist countries’ ones, their ideal had contradiction with reality of Russia. Backward national condition restricts them. Going against social reality is bound to fail. However, if they are in line with the social reality, Russian intellectuals often get back to their own ideals. The fate of Russian intellectuals in the 20<sup>th</sup> century proved the truth of the materialist view of history. Without ideal, there is no motivation and direction for society to move forward. It is a profound political art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od ideal and objective reality.

**Keywords:** road sigh; intellectual; ideal and reality